

清末民初武汉书法勃兴的发生机制

陈玖彤 柳国良

江汉大学美术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本文拟从清末民初武汉时局与书法之间的联系、张之洞湖广幕府金石学术圈的影响及其对武汉书法教育的推动、书家影响等方面综合审视清末民初武汉书法勃兴的发生机制。清末民初，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武汉成为全国经济、政治中心，为武汉地区的人才聚集提供了条件，奠定了武汉书法勃兴的基础；湖广幕府吸引了一众名书家汇聚武汉，形成了以武昌为中心的金石学术圈，新式学堂、武昌美专的建设为武汉书坛培养了大批潜在力量，助推武汉书法向艺术学科化转型；清末民初人才济济的武汉书坛也标志着武汉书法的勃兴。

【关键词】：清末民初；武汉；书法；勃兴；发生机制

晚清时期，汉口通商口岸开辟、卢汉铁路开通，使得汉口经济愈加繁荣，吸引了各地文人学者来汉，民国初期，武汉两次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再成人才云集之所，对武汉书法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福音。此外，张之洞湖广幕府以武昌为中心汇聚了大批善书者，在清末民初尊碑风气之下形成了武昌金石学术圈，新式学堂的出现、武昌美专的建立又为武汉书坛培育了大批新生力量，使得武汉书法得以向艺术学科化逐步转型并蓬勃发展起来。清末民初武汉书家众多，他们或来自五湖四海，或系武汉本土，其书学成就为武汉书坛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影响了一众武汉学人，武汉书法在清末民初因以上种种因素的影响而得到了勃兴。

一、地理、经济、政治要素影响下的武汉书法新际遇

清末民初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被称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时期的书法乃是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武汉作为荆楚文化中心，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作为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武昌曾两次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城市发展不可谓不耀眼，笔者认为，武汉的地理、经济、政治因素是研究清末民初武汉书法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首先，武汉乃中部地区之中心城市，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长江汉水之交汇，中国近代军事、经济、交通重镇。晚清时期正值社会动荡，乱世则武汉之战略地位必将显现。抗战时期，日本军甚至认为攻占武汉即可控制中国，可见武汉战略地位之重要。因此，清王朝统治者及国民政府对武汉地区极为重视。自晚清始，武汉地位即尤为凸显，水陆交通较之前更为发达完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民初武汉又成国民革命中心，汇各界精英于此。可以说，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武汉的经济、政治地位，这也为武汉书法的勃

兴打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汉口通商口岸的开埠，英、德、俄、法、日五国租界的开辟，使得中外各地商人在此聚集，汉口经济以极迅速之势发展起来。1906年，从北京卢沟桥开至汉口的卢汉铁路正式开通，交通的进一步便利使得汉口的经济贸易、人才往来更加活跃。得益于此，汉口一跃成为中国最耀眼的城市之一，日本驻汉领事水野幸吉言：“汉口年贸易额达1亿3000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现已成为清国第二要港，几欲摩上海之垒。鉴于此，机敏的视察者言：汉口乃东方芝加哥。”如此盛况之下的汉口，势必会吸引全国各地文人学者于此旅居，“荆楚境内，沿着长江、汉水流域，产生了大批市镇，如汉口、沙市、宜昌、仙桃、老河口等。市镇人气旺盛，能书者往来甚多，其谈艺挥毫，翰墨交流，亦是平常事。”可以说，清末民初汉口经济地位的提高是武汉地区书法人才往来的重要条件之一。

再次，武昌乃首义之城、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曾于清宣统三年（1911）、民国十五年（1926）年两次成为国民政府首都、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由此，各路精英名流必汇聚武汉，他们为举义而来汉，大多不以书法而闻名，然其皆是由清入民国，受过封建时期的传统教育者，大多有良好的书法功底，如孙文、黄兴、刘心源、张难先、李宗仁、张宗祥等都曾在此进行书法活动并留有墨宝。虽然武汉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时间较短，但是因此两次首都机缘，仍为民国前期的武汉书坛注入了大批新鲜血液。

可以说，武汉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清末民初武汉的经济、政治地位，使得此时期的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经济、政治中心，而经济、政治因素则成为了武汉书法勃兴的关键枢纽之一。汉口通商口岸的开埠客观上促进了武汉经济的发展，卢汉铁路又便利了武汉的交通，这为各地

人才精英在武汉地区的汇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武汉书法的勃兴奠定了基础；民国前期武汉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又吸引了各路书家来汉，推动了武汉书法踏上繁荣的阶梯。

二、武昌金石学术圈的形成及新式学堂出现

晚清时期碑学渐成主流，康有为云：“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诚然，清末帖学已趋于式微，有志之士自然会将目光转向碑学，由碑学着手习书即成自然之势。有清一代，湖北书院林立，学子众多，科举得名者之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而科举考试又与书法关联甚深，凡历科举者大多写得一手好字，故湖北学人之中自然不乏善书者。得益于此，在由帖转碑大潮中，湖北地区书法的发展自然相对其他地区占据一定优势，其书法的发展潜力无疑是巨大的，“观照清前中期帖学盛行的情形，荆楚书法可谓是滞后的。……而至清晚期，碑学突起，遍及全国，荆楚亦能呼应。”由此，湖北书法在同时期各地区中愈发繁盛，张裕钊、杨守敬、刘心源等湖北书家名噪一时，声名远播，正是湖北书法逐步勃兴的体现。

武汉乃是荆楚文化之中心，书家学者荟萃，有着其他市镇不具备的书学环境，其书法于湖北地区自然首屈一指。清光绪十五年（1889）至三十三年期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形成了以武昌为中心的湖广幕府，汇聚了一众名家学者，如杨守敬、沈曾植、郑孝胥、廖荃孙、罗振玉等就曾为张氏幕员，孟庆星在《张之洞湖广幕府书法活动研究》一文中表示：“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形成了以湖广幕府为中心的武昌金石书画学人圈，成为与京师、上海并驾甚至超出他们之上的最为活跃的区域。”张氏在武昌创建两湖书院、存古学堂等新式学堂，并邀请各地书家于两湖书院或存古学堂教习，为武汉书坛培养了大批书法人才，如黄兴、宗彝等书家皆在其中就读，后者在书法上的造诣颇深，甚至称得上清末民初之际武汉书坛的一代宗师。张氏之后，端方成为其继任者，其间亦笼络了金石学者、书画篆刻家入其幕府，延续了湖广幕府的繁荣。一时间，武昌的书学交流、书法活动极其活跃，书法氛围愈发浓厚。可以说，张之洞任职湖广总督期间的各类活动直接推动了武汉书法的发展，其幕员之间各类书风的交流活动、书法研究使得武汉地区书学氛围愈发浓厚，诸新式学堂则为武汉书坛培养了大批书法人才，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书法向艺术学科化的转变。

民国九年（1920），武昌成立了中国中部地区最早的高等美术学校——武昌美术专门学校，该校作为中国最早的艺术教育学府之一，拥有极强的师资团队和教育基础，其虽未设书法为单独学科，但书法作为中国画专业必修课之一，亦

受到极大重视。民国十五年，随着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大批学者、艺术家随之而来，其中不乏有人在武昌美专任职，其间创办杂志期刊、每年举办各类书画展览，使得武汉书法可以更广泛面向大众，这些书法活动无疑推动了武汉书法由实用向艺术的转变，逐渐成为一门完全的艺术门类。

随着碑学异军突起、高素质人才带动的书法创新，武汉书法抓住了时代潮流而蓬勃发展；湖广幕府为武汉集结了大量优秀人才，他们在汉进行书法交流活动、在新式学堂教学，启迪了大批武汉学子；武昌艺专的出现及其书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国前期武汉书法由实用性向艺术性的转变。正是因此，武汉书法抓住了时代给予的机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勃兴。

三、在汉书家之于武汉书法的意义

关于对武汉书法起到一定影响的书家，笔者将其分为三类进行阐述，一是流寓武汉的幕府书家；二是湖北籍在武汉有所活动的书家；三是武汉本土书家。这些人中有专业书家、政客名流、学者教授等，他们的存在客观上反映了清末民初武汉书法的繁荣程度，对武汉书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首先，张之洞、端方先后任湖广总督，且以湖广幕府为中心形成了武昌金石学术圈，一时间学者书家云集，他们或以收藏成名，或以研究为善，或以善书著称，亦或长于篆刻，笔者在此列举部分。张氏任湖广总督期间，如沈曾植、郑孝胥、廖荃孙、罗振玉、陈衍、王同愈、吴大澂、陈庆年、樊增祥、王仁俊等皆为其幕员。张氏之后端方继任湖广总督，其间除幕府部分原始成员外，亦有如黄牧甫、黄士陵、黄少牧等名家在汉活动。此外，因其他原因在武汉活动者如陈豪、梁鼎芬、孙文、黄兴、张宗祥等皆有书名。此类书家的存在使得武汉书法一时间流派纷呈，推动了清末民初武汉书法的创新与发展，这些人之中还有部分任职于新式学堂教习者，书学影响颇为深远。

其次，湖北籍在武汉活动的书家亦是清末民初武汉书家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知名者甚众，如张裕钊、杨守敬、刘心源、黄云鹤、周祺、张难先、沈肇年、金丹、田桐、黄侃、董必武、朱峙山等，书名皆颇为时所重。其中张裕钊、杨守敬、刘心源更是被誉为“湖北三大书法家”，张、杨二人书名更是远播海外，其成就足以称之为荆楚书坛之标杆，以其深远影响力定会为武汉学人推重，进而吸引大批追随者。

再次，武汉本土书家亦有不少名家，其影响主要在武汉及其周边地区，知名者有宗彝、冯家灏、黎元洪、冯铸、吴宝珩、叶志诜、杨承禧、关棠、李昌誉、黎澍、陈元祥、叶名琛等，其书名地位或在全国不甚显赫，然对于武汉书法的

影响颇为深远，如宗彝、冯家灏皆是名闻荆楚之名家，颇为时人推重，冯铸先后师李瑞清、吴昌硕，享誉其时。此类书家多常居武汉，比之以上两类书家，武汉本土书家在武汉的民众性自然更胜一筹，如果说以上两类书家影响更多的是武汉学人，那么武汉本土书家的影响力则在普通百姓、市井之间更胜一筹。

简而言之，以上书家的影响力触及到了武汉的各个阶层，为武汉学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们用自身的经历、成就、精神等优异品质鼓舞着后世书家不断探索和创新。

四、结语

武汉的地理优势为其奠定了重要的经济、政治地位，得

益于此，动乱的年代反而成为了武汉书法发展的契机。汉口作为通商口岸，又开辟五国租界，武昌两次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吸引了各路精英来汉，一时间书家汇集，武汉书法凭借其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而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契机；碑学兴起为武汉学人提供了新的书学探索方向，善书者众多的优势使得书法拥有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此基础之上，湖广幕府为武汉聚集了各地名书家，新式学堂、武昌艺专的出现为武汉书坛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推动武汉书法向艺术学科化转型；在以上种种因素共同影响下，清末民初的武汉书法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落寞之后勃然而兴，成为荆楚乃至全国书法之翘楚。

参考文献:

- [1] 水野幸吉.中国中部事情-汉口[M]//.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4: 1
- [2] 钟一鸣.荆楚书法[M]//.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4: 243]
- [3]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著[M]//.崔尔平, 校注.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0: 60
- [4] 钟一鸣.荆楚书法[M]//.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4: 242
- [5] 孟庆星.张之洞湖广幕府书法活动研究[J]//.中国书法, 2016: 134

本文为武汉研究院开放性课题一般项目《武汉书法史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 IWHS20182045；湖北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民国时期武汉书法篆刻群体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 S201911072073。